

南诏

和

大理国

宗教艺术

刘长久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by Liu Changjiu

The Religion Art in
Nanzhao and Dali Kingdom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南诏和大理国宗教艺术



刘长久 著

The Religion Art in
Nanzhao and Dali Kingd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DF
PDF
PDF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诏和大理国宗教艺术/刘长久 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5

ISBN 7-220-05414-9

I.南... II.刘... III.①南诏-宗教艺术②大理政权-宗教艺术 IV.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24462号

摄影: 王达军 张问渔 刘长久

责任编辑: 张问渔

装帧设计: 刘长久

制作: 急转弯工作室

责任校对: 何秀兰

南诏和大理国宗教艺术

The Religion Art in Nanzhao and Dali Kingdom

刘长久 著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网 址: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fs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6679239

印 刷: 天时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mm 1/16

印 张: 7.5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0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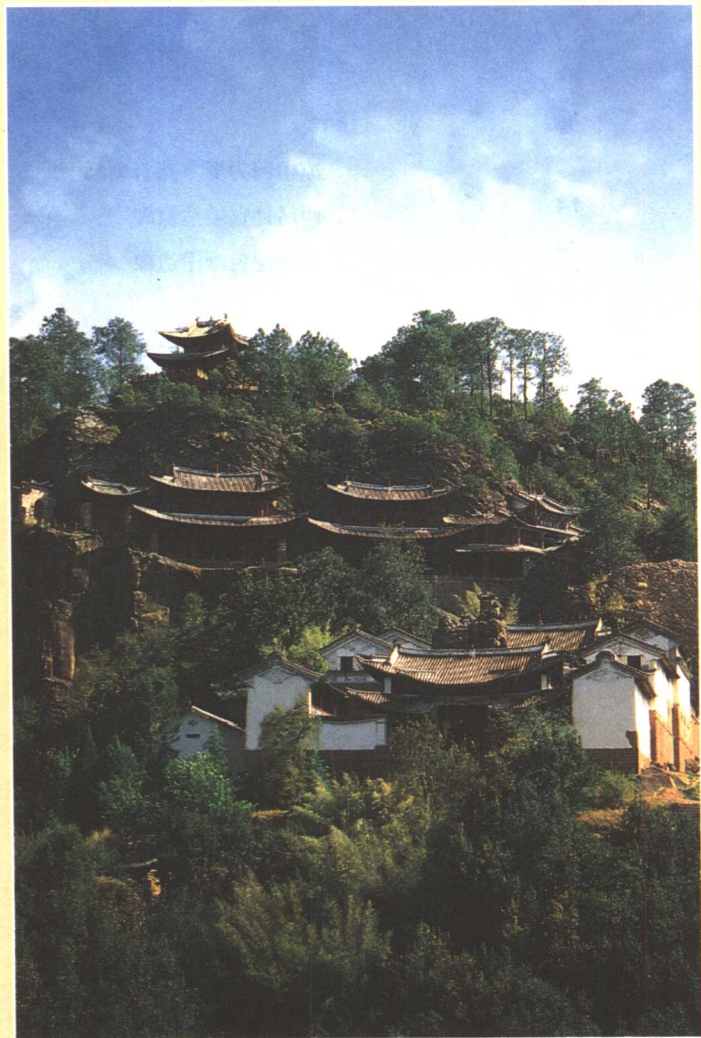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220-05414-9/J·413

定 价: 60.00元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剑川石钟山石窟

第一章 南诏和大理国的历史概况	1	供养人	51
		南诏王出行图	51
第二章 南诏和大理国的宗教	3	动物	53
一、原始宗教：巫教	3	其他	54
二、佛教的传入及其发展	4		
三、道教的传播和影响	10	补 述	55
第三章 剑川石窟	14	一、凉山阿力罗卜惹石刻画	55
一、窟龕形制和造像年代	14	二、西昌钟官坡造像碑	55
二、造像题材	16	三、大理挖色摩崖造像	55
密宗“阿叱力教”题材	17		
本主崇拜题材	25	第八章 南诏和大理国石窟艺术风格	56
显教题材	29	一、南诏时期	56
“波斯国人”题材	32	二、大理国时期	57
第四章 安宁法华寺石窟	35	第九章 南诏和大理国石窟以外的宗	
一、窟龕形制和造像年代	35	教绘画、雕塑艺术	62
二、造像题材	36	一、绘画	63
从十六罗汉到十八罗汉	36	《南诏图传》	63
佛传故事	37	《张胜温画卷》	71
地藏与观音菩萨	39	二、雕塑	80
第五章 晋宁将军庙和禄劝密达拉三		附 录 南诏和大理国石窟内容总录	84
台山摩崖造像	40	一、剑川石钟山石窟	84
一、晋宁将军庙摩崖造像	40	石钟寺区	84
二、禄劝密达拉三台山摩崖		狮子关区	94
造像	41	沙登箐区	97
第六章 昆明地藏寺大理国经幢	42	二、剑川金华山摩崖造像	100
第七章 凉山不意瓦衣石刻画	45	三、安宁法华寺石窟	100
一、凉山不意瓦衣石刻画的		四、大理挖色摩崖造像	104
开创年代	45	五、晋宁将军庙摩崖造像	106
二、凉山不意瓦衣石刻画的		六、禄劝密达拉三台山摩崖	
题材内容	46	造像	107
密宗“阿叱力教”造像	46	七、昆明地藏寺经幢造像	108
显教之佛像	49	八、凉山不意瓦衣石刻画	110
		后 记	116

第一章 南诏和大理国的历史概况

云南(简称滇或云)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因以在云岭之南故名。秦代为滇国,汉代属益州,三国蜀汉时分置云南、永昌等郡,唐初属南宁州及姚州,后属南诏,宋代属大理国,元代置云南行中书省,明代置云南布政使司,清代始为云南省。它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其文化多样而丰富。

20世纪60年代,在云南元谋、丽江、西畴发现腊玛古猿化石以及旧石器时代遗物,证明在远古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在那里生息繁衍。新石器时代,以滇池为中心和以洱海为中心,成为云南古代文明的两大摇篮。洎至唐宋,南诏和大理国雄据云南达570年之久,乌蛮(彝族)和白蛮(白族)创造了璀璨的文化,彪炳于云南历史。

唐代初期,在今云南的洱海地区聚居着许多少数民族部落,尤以六诏最著名,即蒙雋诏(今巍山北部至漾濞一带)、越析诏(今宾川县境内)、浪穹诏(今洱源县北部)、邆賧诏(今洱源县南部)、施浪诏(今洱源东北部)、蒙舍诏(今巍山县境内)。由于蒙舍诏地处五诏之南,故又称“南诏”。除越析诏为“磨些蛮”(即今纳西族之先民)外,余皆为“乌蛮”。同时,在洱海周围还居住着众多的“白蛮”部落,时称“西洱河蛮”或“河蛮”。

关于南诏的历史,主要见载于唐代樊绰的《蛮书》,新、旧《唐书》之“南诏传”。而后者则是综合了已散佚的袁滋《云南记》、韦齐休《云南行记》、窦滂《云南别录》、徐云虔《南诏录》、卢携《云南事状》、韦皋《西南夷事状》、李德裕《西南备边录》等著述上的材料。此外,则见载于元代张道宗《记古滇说集》、元代李京《云南志略》、明代杨慎《滇载记》、蒋彬《南诏源流纪要》、阮元声《南诏野史》、佚名《樊古通纪浅述》、清代圆鼎《滇释纪》、《白国因由》,等等。明清所编纂的云南地方志,大多援引上述诸书。

据说南诏的始祖舍龙(又名龙伽独)为避仇携子细奴罗(又名独罗消)从哀牢山(今云南保山县东部)迁徙到巍山,从游牧转事农耕,日渐强盛。细奴罗并六诏,云南诏张乐进求逊位于细奴罗。细奴罗建大蒙国,自号奇王。后经其嗣罗盛、盛罗皮、皮罗阁、阁罗凤的奋斗,终于统一了云南,建立了以奴隶制为主体的民族地方政权。

南诏第五世王阁罗凤统一云南后,南诏进入了极盛期。由于吐蕃(今西藏)的介入,使南诏与李唐王朝原有的臣属关系发生了变化。即南诏在吐蕃军队的支持下,于天宝年间两次大败唐兵,搅得李唐王朝深感不安。天宝十一载(752年),吐蕃王还册封阁罗凤为“赞普(藏语,意为“王”)钟(藏语,意为“兄弟”)南国大诏”。同年,阁罗凤还改元为“赞普钟元年”,愈加成为李唐王朝的边患之一。

南诏第六世王异牟寻即位后,曾联合吐蕃企图攻取四川成都,然被唐军击败。于是吐蕃迁怒于南诏,仅封异牟寻为“日东王”,又不赐金印,以此将原有的兄弟之国的关系降为臣属关系。异牟寻对此极为不满,在清平官(相当于宰相)郑回的劝说和经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等人的斡旋之下,异牟寻决定归附于李唐王朝,并分别派遣三批使者入唐表诚心。贞元十年(794年),韦皋派节度巡官崔佐时赴南诏会盟,史称“苍山会盟”。会盟后,唐德宗又遣使于南诏,赐异牟寻银巢金印“贞元册南诏印”,册封为“南诏王”。



异牟寻死后，其子寻阁劝即位，仅一年便夭亡。接着劝龙晟即位，因“淫肆不道”招致“上下怨疾”。此时大权旁落于弄栋节度使王嵯颠手中，于是杀劝龙晟，立劝利晟为王。劝利晟在位八年，死后由劝丰佑即位。劝丰佑时，南诏佛教盛行，劝丰佑笃信佛教，大兴佛教建筑和造像。829年，权臣王嵯颠撕毁了南诏与李唐王朝的盟约，兴兵攻打成都，掳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和大量财宝。后来又侵犯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劝丰佑在位三十五年，死后由其子世隆(又叫酋龙)，因名隆而犯唐玄宗李隆基之讳，未被李唐王朝册封。世隆气极败坏，再度与李唐王朝交恶。如《资治通鉴》卷二五二说：“南诏酋龙嗣立以来，为边患殆二十年。”其间大肆对越南、广西、贵州、四川等进行掠夺战争。加之大军将领宗榜杀王嵯颠，促使南诏内部矛盾加剧。世隆在位十八年，死后由隆舜即位。隆舜久居鄯阐(今云南昆明)，耽于酒色，权柄实际握在清平官郑买嗣手中，隆舜在位二十年，被近臣杨登所杀，由隆舜之子舜化贞即位，仍委政于郑买嗣，不久，杨登被杀。舜化贞在位六年，死于902年。南诏至此告终。南诏传十三世，共255年。

南诏灭亡后到大理国兴起，其间三十余年，出现了以白族为主体的三个地方政权。即郑买嗣篡位后所建大长和国，传三世(即郑买嗣、郑仁旻、郑隆宣)，共二十六年；赵善政之大天兴国，在位仅十个月；杨干贞之大义宁国，在位八年。

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8年)冬天，段思平推翻了杨干贞的大义宁国，建立了以白族为主体的领主制大理国。由于段思平实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并与赵宋王朝建立了各种关系，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巩固了白族领主的政治、经济地位。

段思平在位八年，死后由子段思英继位。段思英仅在位一年，其叔段思良争位，废段思英，自立为王。段思良在位七年驾崩，由其子段思聪接位。段思聪在位十七年，死后由段素顺即位。在此前三年，宋太祖赵匡胤遣四川行营前军都部署王全斌攻灭后蜀。大理国遣使致信赵宋王朝，贺平定四川，并要求与之通好。段素顺即位后，宋太宗曾册封段素顺为“云南八国都王”。自段素顺起，大理国各代王均自四川向赵宋王朝进贡，并要求进一步加封。

到了大理国第十一世王段思廉在位期间，由于分封的原因，使一部分白族领主争权夺利，进而酿成动乱。西部洱海地区的杨允贤和杨义贞先后策动政变，大理国主无力镇压，只得借助东部滇池地区的高智升和高升泰，才得以平息，高氏便成为势力最强大的领主。第十三世王段寿辉封高智升为相国，封高升泰为鄯阐侯。段寿辉仅在位一年，便“禅位”于段廉义(又称段连义)的侄子段正明。段正明在位十三年，又“禅位”于高升泰。高升泰改“大理国”为“大中国”，仅在位一年后又还政于段氏。

段正淳即位后，史称“后理国”(即大理国后期)。由于高氏的割据称霸，到了后理国时期，纷争愈演愈烈。如东方三十七蛮部的首领，不仅各据一方，而且相互争战掳掠，使得后理国主难以控制。此引起了各族民众的极大不满，纷纷起事反抗，促使后理国政权摇摇欲坠。

1252年，元宪宗蒙哥派其弟忽必烈(元世祖)率兵攻打大理国。次年，忽必烈领十万大军，分三路进攻大理国，拿下了大理国首府苴咩城(大理城)。翌年，于昆泽(今云南宜良县)俘虏了后理国末代国主段兴智。是年为1254年，大理国政权宣告灭亡。大理国共传二十二代，计315年。

元代始建云南行省，段氏被封为世袭大理总管，传十一代。



第二章 南诏和大理国的宗教

一、原始宗教：巫教

原始宗教，一般说来是指史前社会人类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自发性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教。在中国许多少数民族中，至今仍然保留着某些原始宗教的残余。巫教即原始宗教，在中国古代各民族中均有很大的影响。

巫教是一种自然宗教，其特点是：没有创教人，也没有严密的宗教组织，仅是各民族的自发信仰，起作用的血缘关系；没有脱产的专职宗教人员，也没有支配信仰的权威，只有不脱产的兼职巫师，仅是人神之间的媒介，无支配信仰的特权；没有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而是以自然神为主，即使从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也是多神信仰；没有教派之分，只有血缘性、狭隘性和地方性；没有经典和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往往是宗教信条、禁忌和生活习俗交织在一起；没有固定的宗教场所，基本上是在氏族或村落内活动。^①

(一)政教不分，政治领袖即宗教领袖。

(二)宗教领袖，或名耆老，或名鬼主，或名朵兮幡。

(三)宗教法服，多为披毡，乃保留牧羊人之遗俗。

(四)以龙为图腾，乃夏民族之遗俗。

(五)以树枝象征神祇，或指社神所在。此种教仪，流入中原，遂演变为古代之“社”。如夏后氏以松，是其一例。而保存于西北羌族中者，仍为树枝。

(六)以三白石代表神，后此三白石变为支釜之三足，而三白石之所在，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处。以后流入中原，变为国家重器，即鼎是也。其保存于西南者，则为三角架，仍为神圣之物。

(七)以火为神圣之物，加薪于火坛必主人亲为之。^②

南诏初期，乌蛮与白蛮均信仰巫教，其部落酋长或领主作为主祭者又称为“鬼主”，而且按照部落的规模大小，又有大鬼主和小鬼主之区别。如唐代樊绰《蛮书》所说：“大部落则有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又《新唐书·南诏传》说：“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髻髻，女人披发，皆衣牛羊皮，倘尚巫鬼，……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

白族初信仰天鬼(或称“五百天”、“我白天”)，视为民族守护神，并设立天鬼坛祭祀。南诏中期以后，这种民族守护神又逐渐演变为“本主”。

天鬼的祭祀活动，从南诏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每三年举行一次，一般是九、十月间农闲季节，时间为一天，祭祀活动开始，全



^①参见宋兆麟《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3-4页。

^②参见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年1月第1版，第264-265页。



村老人小孩跟着巫师“朵兮幡”敲锣打鼓、吹唢呐，到牛圈里把祭天鬼用的“天牛”迎出来，在牛头上挂上红彩，接到天登(祭天鬼的天台)上。全村人聚集在一起，由“朵兮幡”祈祷、念咒，然后宰杀天牛，肉和皮平均分给每家村民食用。其经费开支大半由当年有病的人家出，不足部分再按户分担。在南诏时，除用牛祭祀外，也有用人作祭品的。如《资治通鉴》载：“唐睿宗景云元年，姚州西洱河蛮酋傍名攻杀监察御史李知古，以其尸祭天。”

所谓“本主”，即“本地区的主宰神，即掌管本地区、本村寨民的生死祸福之神。”^①

最初的本主多属自然崇拜之神，如山岳之神、海神、水泉之神、太阳神、洪水神等。后来又加进了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如南诏和大理国历代帝王将相、忠臣孝子、战神、有功于民之神等。各村落不仅建本主庙很多，而且所供奉的本主有所不同。本主的神祇很多，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举凡62种。但据张福三《白族本主崇拜及其传说的人间性和世俗化》一文说：“徐先生的统计不完全，据近年调查，大理白族地区供奉本主神祇有413堂多之。”^②

本主崇拜中的自然神和图腾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但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已带有人为宗教的成份。因此，本主崇拜是介乎于自然宗教和人为宗教之间的一种民间宗教。

现存大理州的木雕、泥塑、石雕本主造像很多，反映在云南石窟中的本主造像，主要见于剑川石钟山石窟三窟南诏王造像，以及现存四川境内的凉山不意瓦衣(原误为博什瓦黑)石刻画北区第9号南诏王出行图。而且都是一些在南诏历史上具有很大影响的王者，如细奴罗、阁罗凤、异牟寻、世隆等。

二、佛教的传入及其发展

佛教发端于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何时传入云南?对此学术界有以下几种意见:

(一)迦叶传入说。袁嘉谷先生在《滇南释教论》中说：“滇之法源，厥为迦叶。”他以传说的云南宾川县鸡足山系迦叶道场为由，援引大错和尚《鸡足山志》和释圆鼎《滇释记》等书，试图说明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之大弟子迦叶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到云南入定鸡足山，弘传佛法。而且断言：“吾故曰：未有译经之时，佛道已东入滇境，无可疑也。”这种说法，显然不足取信。因为印度佛教传入中土，公认为在两汉之际，即公元1世纪左右。既然如此，佛教又怎么可能于公元前5世纪传入云南呢?

(二)东汉传入说。袁嘉谷先生又在《滇南释教论》中说：“若夫译经之后，则绥哀牢、开永昌、度博南，正崇重浮图之明帝时也。滇有汉字之佛经，则又当自中原来。安宁者，汉连然县也。法华寺后有晒经石，《县志》云：相传为蔡愔取经遭雨，晒此，遗数叶，遂成灵迹。”

^① 参见张旭《白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天鬼》，载《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76页。

^② 参见《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304页。

这显然是说在汉明帝时汉地佛教已传入云南，所谓蔡愔去印度求法返经云南安宁遇雨晒经之事，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自然是不可信的。明帝遣使蔡愔等人西去求法并不见于《后汉书》，而首见于北齐王琰《冥祥记》。据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永平求法传说之考证》说：“……去张騫、秦景、王遵三人，而易以蔡愔，复加一摩腾故事，构成后世公认求法之史实。然王琰既言如诸传备载，则此条可证为抄集而成。蔡愔、摩腾故事，显更为晚出之事实。刘宋以前既不见于正史，又为佛家所未称述，则其说不可信，盖可知矣。”^①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说：“……是在汉人之心目中(指博望侯)，昆明(即大理)与身毒(印度)，最为接近。而佛教在汉哀帝时，已入中国。至东汉和帝永元元年，中国梦想之计划，始告完成，由叶榆永昌(今大理保山)通掸国(缅甸)、罗马(大秦)，音乐、技艺皆相继输入。则佛教由中原内地输入大理，自在意中。”又说：“……《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哀牢物产，其中有两种极堪注意者。一为琉璃，一为蚌珠。按《文献通考》三三八四‘裔考大月氏下’云：‘大武时，其国人商贩到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惊以为神明所作。自此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永昌在汉代已有琉璃，而琉璃又为大月氏人之特技。大月氏在西汉时已信佛教，又为东汉时佛教重镇(汤氏语——即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所言也，引者注)。大月氏之琉璃在汉代已自印度缅甸而入永昌，则大月氏所奉之佛教，与琉璃同时传入永昌，乃意中事也。又永昌地处高原，不产蚌珠。其为缅甸输入，殆无疑义。则佛教由缅甸入大理永昌，亦意中事也。”^②

袁嘉谷先生和徐嘉瑞先生的“东汉传入说”仅是一种主观猜测，均不足信。

(三)初唐传入说。徐嘉瑞先生提出“东汉传入说”之后，自感论据不足，于是又说：“惜此等具体史实，缺乏记载，无从臆测。在汉以后，如梁启超称‘道生入印度，乃由吐蕃尼波罗路’。道生简文时人，无入印度之事，不知梁氏何据？梁氏又云：‘古代唐僧二十余人，经滇缅路而至印度。’则佛教在唐代有由印度入大理之可能也。”又说：“佛教之入大理，其路线为西藏，已如前述。其时间约在唐初，亦可推定。至于唐以前佛教，是否已入大理，则史籍无证，未敢臆测。”^③徐嘉瑞先生一会儿持“东汉传入说”，一会儿又持“初唐传入说”，不仅前后矛盾，而且“初唐传入说”也缺乏充分的依据。所引梁启超先生所谓唐僧自滇缅道入印度之说，也与史实不符。清代王崧校理本《南诏野史·大蒙国》也说：“唐僧取经及佛像回，过点苍(今云南大理苍山——引者注)，雨湿经，晒于坡间，故今名晒经坡。僧回，注《般若经》。”^④所谓唐僧取经，即指唐代玄奘自印度取经回中国唐都长安之事，实际上玄奘往返均由西北陆路，从未经过云南。因此，唐僧取经过云南大理，纯系杜撰之说。

(四)中唐传入说。王忠先生《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说：“南诏之有佛教，后世传说皆谓始于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此为南诏佛教兴盛后欲神异其祖细奴罗得佛保佑而造作之神话，恐不足信。《张胜温



^①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第18-19页。

^②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年1月第1版，第294-295页。

^③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87年1月第1版，第295、313页。

^④ 转见木芹《南诏野史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第35页。

画卷》中所有密教诸僧，其名目与西藏略同。是南诏佛教实由吐蕃传入。南诏成为吐蕃之属国虽始于752年，而吐蕃实际控制南诏又为779年异牟寻受封日东王以后之事。阁罗凤之《德化碑》尚无佛教之影响，即至德宗贞元十年异牟寻与崔佐时定盟，誓文亦只上达三官，并未求证佛陀。凡此皆足证其‘欲尚佛屠’，已为异牟寻以后之事矣。”此说虽未明确提出“中唐传入说”，但“‘俗尚佛屠’，已为异牟寻以后之事矣。”含有“中唐传入说”之意。

明确提出“中唐传入说”的是黄惠焜先生，他在《佛教中唐入滇考》一文中说：“佛教之传入南诏，上限应在中唐丰佑之间”“大体说来，云南于中唐以前广信巫鬼，不见佛教。”又说：“……何以佛教入滇，仅在中唐，既不在汉晋，也不在元明？这是因为，云南既得佛教，即载之于文书，见之于文物。中唐以前，既无文字可征，又无文物可证；中唐以后，则佛教已见大振，不似初入情况。故中唐之说，是基于目前所知材料，斟酌所得。”^①

(五)晚唐传入说。方国瑜先生在《云南民族史讲义》第三册中说：“细奴罗事迹的传说，为佛教徒所臆造，中兴二年图画题记所谓‘圣教初入邦国之原’，是佛教徒附会出来的，佛教传入在南诏晚期。此类说法，当发生于佛教传入以后，而佛教徒附会则有原始传说的依据。”又《新纂云南通志》卷一〇三“佛教”说：“始主庙之故事，张道宗《记古滇说集》……‘威成王诚乐(盛罗)……册杨道清为显密圆通大义法师，始塑大灵土主天神像曰摩诃迦罗，筑滇之城。’……说不可信……，此教晚唐盛于云南，当晚唐以后始奉也。”

(六)元明传入说。据黄惠焜先生的《佛教中唐入滇考》一文说：20世纪80年代，云南有部分学者认为佛教虽于唐代传入南诏，然仅为阿叱力教即密教而与小乘无涉，就整个云南而言，小乘佛教的传播及其普及，当在13世纪至16世纪的三百年间。其说主要依据元代《马可波罗行记》和《百夷传》。

众所周知，佛教有大乘和小乘之别，但就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而言，却没有大乘和小乘之分，凡属佛教一旦流布于云南境内，即为云南佛教的开端。因此，“元明传入说”仅限于小乘佛教，以偏概全，便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

杨学政先生主编的《云南宗教史》一书中对佛教传入云南提出了：“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印度密教阿叱力由摩揭陀国(现今比哈尔邦南部)经缅甸北部传入南诏国。受南诏王细奴罗崇敬，开建五密坛场，弘瑜伽法。”又说：“公元714年(唐玄宗开元二年)，南诏王晟罗皮遣宰相张建成向唐朝入贡通好，唐玄宗厚礼相待并赐佛像，归途滞留成都学习佛经，回滇后传扬佛教，中原汉传佛教开始传入云南。”这就是说密宗“阿叱力教”于7~8世纪自印度经缅甸传入云南。中原汉地佛教于盛唐开元二年(714年)由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经四川成都传入云南。同时，该书又提出：“公元11世纪中叶，藏传佛教宁玛派和噶举派相继由四川和西藏传入滇西北地区。”“公元13~14世纪，南传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一引者注)开始以较大规模从泰国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始建僧团和佛寺、佛塔。”^②《云南宗教史》是云南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一项集体科研成果，经5年调研而完成的。该书对佛教传入云南的年代

①参见《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②参见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25、178、239、329页。



应当说较为可信，但是否南诏初始就有佛教传入，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于佛教传入云南的途径，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中土说。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提出：“佛教之输入大理，当远在汉代，由中原内地输入。”此说如前所述，就传入的时间来说是缺乏依据的，至于传入途径“由中原内地输入”仅是一个方面，不尽然。方国瑜先生在《新纂云南通志》卷一〇三“佛教”中说：“佛法传至云南之事迹，不获详考，惟据片断之记载，……主流则自中土来。童真所云‘经文与人相同者’，谓经文与人，同于中云；郭松年《大理行记》亦谓‘所谓经律，一如中国’。知所传授之经典，得之于中土，非梵文，亦未必此土人传译也。”此说依据汉译佛经流传于云南，而推定云南佛教由中土(指中原内地)传入，并视之为传入途径的主流。这种主流说，似有一定道理，但略嫌证据不够充分。

(二)吐蕃传入说。王忠先生在《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说：“《张胜温画卷》中所有密教诸僧，其名目与西藏略同，是南诏之佛教，实由吐蕃传入。”就传入途径而言，云南密宗由吐蕃传入实有可能。但云南佛教非独为密宗，还有禅宗等显教，无论《南诏图传》，还是《张胜温画卷》均绘有显教题材，如禅宗六祖像等。因此，密宗由吐蕃传入云南仅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还有自印度传入的途径，如印度僧人赞陀崛多到南诏传密宗“阿叱力教”。同时，禅宗等显教则由中原内地传入云南，特别是四川，从云南禅僧多为蜀籍可证。

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也说：“佛教之入大理，其路线为西藏。”“惟有西藏一路则在地理、政治、军事上，与南诏关系甚密，而风俗习尚及民族迁徙关系亦多。南诏佛教之传说，亦以密教为最多且久。即印度僧人，有入南诏者，亦皆为密教法师。且大理之神话，为罗刹故事，乃由西藏之罗刹神话转变而来。又《白国因由》中，左白象，右白马之有须观音，即大理之莲冠老僧，亦即西藏莲花生大师也。”此说仍属偏持一端。徐先生把有须观音混同于西藏红教祖师莲花生，显然是不妥当的。莲花生系8世纪印度僧人，应吐蕃王赤松德赞之请入藏传密法，曾利用密宗法术同苯教巫师斗争，终于取胜。后被藏传佛教宁玛派尊为“祖师”。至于南诏流传的“观音化现梵僧制服罗刹”的故事，是否由西藏罗刹神话转变而来，似缺乏充足的证据，尚待研究。

(三)多源说。所谓“多源说”，即指佛教传入云南的途径是多渠道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较多，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较符合实际。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说：“……南诏初期，尚行巫教。及贞观开元之际，佛教始输入大理。其输入之路线一为中原，二为印度，三为缅甸，四为西藏。”此说仅就传入途径而言不无道理。至于徐先生为什么在一书中所持观点前后矛盾且反复多变，原因在于他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写于1944年，印行于1949年，1978年重版时作过一些修改，不失为一部资料较为丰富的著作，但由于对后来所发掘的南诏和大理国的新资料未及深涉，因此对某些问题把握不定。这是可以理解的。

近年来，云南的一些学者对于该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如黄惠焜《佛教中唐人滇考》一文说：“……佛教之





传入南诏，……其传入路线则既有中土、西域，又有吐蕃、骠国(即缅甸——引者注)，而小乘一派在我国掸傣居民中之传播，……路线则自东南亚。”此说从宏观上作了总体把握，既兼顾了大乘与小乘，又兼顾了显教与密教。笔者赞同此说。又如王海涛在《试论南诏佛教的传入》一文中说：“佛教密部迟于八世纪初由印度和西藏传入云南，为南诏彝族政权接受并发扬。”^①又在《南诏佛教文化的源与流》一文中说：“南诏佛教以密教为主流，早期传入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曰天竺道，代表神是湿婆——即大黑天神；二曰吐蕃道，代表神是观音。此外，从阁罗凤时代开始，中原大乘通过战争、联谊断断续续传入云南，带来了内地佛教文化(如建筑物塔)，但在教义上却不能动摇密宗的主导地位。”^②王海涛二文重在密宗“阿叱力教”，未详及整体佛教传入云南之途径。

综上所述，佛教传入南诏，当在中唐，至劝丰佑时大盛，传入途径是多源的。笔者认为南诏初始，所谓观音化现梵僧制服罗刹和授记南诏创始者细奴罗，纯系后人杜撰之神话。《梵古通纪浅述》中所谓细奴罗“施五事”之一“劝民每家供养佛像一堂，诵念经典，手拈数珠，口念佛号”。也系后世附会之说。关于在大理“造三塔，建崇圣寺”之年代，《大理行记》、《南诏野史》、《梵古通纪浅述》、《记古滇说集》、《云南图经志书》等说法不一。有“贞观六年”(632年)者，有“上元元年”(674年)者，有“开元元年”(713年)者，有“丰佑保和十年(833年)至天启元年(840年)”者，有“丰佑保和十年至天启九年(848年)”者。造塔建寺应在佛教传入之后，因此，大理三塔和崇圣寺当建于劝丰佑时代。元代李京《云南志略》所谓南诏第三世王盛罗皮于“开元二年，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它书不见载，不知此说何据?此不足信。《梵古通纪浅述》所说：南诏第四世王皮罗阁于“天宝六年十月，筑太和城，因唐赐《金刚经》至，故名金刚城”。《南诏野史》等诸书只言筑太和城之事，且时间有异，未言及唐赐《金刚经》之事，此亦不足信。《梵古通纪浅述》所载南诏第五世王阁罗凤生平中，有阁罗凤以“买嗟罗贤者为国师。贤者乃西天第五祖商那和修化身”。天宝“九年，……药师佛领十二神王自西天来，主以兵陷嵩州，得唐西泸令郑回，重其才，拜清平官”。赞普钟“二年癸巳，……唐使张阿蛮领青龙、白虎二兽及兵万众，吸洱河水涸干，无计可遏。……翁乃画一观音，有十一面，座下画一龙虎，敬于法真寺内”。“天宝十三年，……杨都师在东岩石孔礼拜佛，白犬吠之，龙怒而出”。“时赞普钟十三年，……建法真寺敬天，日遍照佛像。佛至灵，卜事吉则佛低头，卜事凶则佛不动”。如此等等，均系附会和杜撰之神话。又，《南诏野史》胡蔚增订本说：“凤(即阁罗凤——引者注)乃叛唐，建元长寿。遣弟阁陂和尚及子铎传、酋望赵佗邓、杨传磨牟等，并子弟六十人献凯吐蕃。陂有神术，人马往来吐蕃，不过朝夕之顷。……此二役也，皆凤弟阁陂和尚及凤妃白氏，行妖术，展帕拍手而笑，韩陀僧用钵法，以故唐兵而败”。这里所说的阁陂和尚，在今剑川石钟山窟石钟寺区第2号南诏王阁罗凤议政图中亦有阁陂和尚造像，是否可证阁罗凤时已有佛教传入呢?从阁陂行妖术又似非佛僧所为。因此，方国瑜先生在《剑川石宝山石窟造像》一文中认为：“盖阁陂是巫者，阁罗

^①转见《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378页。

^②转见《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324-325页。

凤策士，传说为佛徒。”此言甚是，既为传说，当不足为信。因为阁罗凤的继承者异牟寻归唐时，双方曾遣使于大理苍山会盟，其誓文，据唐代樊绰《蛮书》载：“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巡官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使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贻诫子孙。伏维山川神祈，同鉴诚恳。”此中见不出一佛影，却可见出道教五斗米道的三官手书方式和祈请自然的巫教仪式。由此可见，异牟寻时代巫教与道教并行。

洎至南诏第十世王劝丰佑时代，佛教已流行于南诏，而巫教和道教逐渐被削弱。特别是印度僧人赞陀崛多来南诏传密宗“阿叱力教”，更是占了上风。到大理国时期，密宗“阿叱力教”成为云南佛教的主流。《滇云历年传》记述：劝丰佑时，“僧赞陀建元化寺于鹤庆。王嵯颠建大理崇圣寺，……文宗太和元年，丰佑母出家为尼，改名慧海。是年用银五千铸佛。南诏废道教。……三年，……于善阐建东寺塔，高百十五尺，西寺塔高八十尺。又建妙应寺并塔。”对此，《南诏野史》胡蔚增订本、《樊古通纪浅述》等书所述更详，但融入了不少神话色彩。不过，从中可见出劝丰佑及其母不仅笃信佛教，而且造塔建寺、开窟凿像也蔚然成风，剑川石钟山石窟就是开创于劝丰佑天启年间，现存该石窟沙登箐区第1号之“天启十一年”造像题记，即是佐证。

劝丰佑之子世隆继位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行佛教，连年建寺造像，以敬佛为首务。企图借助于佛教来摆脱日益加深的内部危机，以便维持统治。如《樊古通纪浅述》所述：“王伐益州。得一观音，……凯回至国，以所得金银钱粮写《金刚经》一部，易长观音像，铜钟一二（即铜钟十二），效之而写《金刚经》，设观音道场。观音化梵僧来应供。主曰：‘吾欲再征伐，如何？’僧曰：‘土广民众，恐难控制乃止。主以四方八表夷民臣服，皆感佛维持，于是建大寺八百，谓之蓝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中，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世隆时代，密宗“阿叱力教”愈加兴盛，不仅民间广为信仰，而且世隆出师征战必有阿叱力僧随行，上至王者下到士兵均信阿叱力僧的咒术。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凉山不意瓦衣开凿了大量的密宗石刻画。

世隆的儿子隆舜仍然崇信佛教，《樊古通纪浅述》载：“主（隆舜）为世（世隆）子时，好田猎，至巍山，遇一老人告曰：世子能造观音像否？如造，声名所及，无不臣服。曰：能之。若造，须如来之像方可。乃以兼金铸阿嵯耶观音，至是，远见巍山颇有白气，使李紫奴往，挖得铜钟一，重三百两，阿嵯耶观音一位。自号摩诃罗嵯耶。辛亥年，以黄金八百两铸文殊、普贤二像，敬于崇圣寺，以鄯郫（阆）为东京，以杨睑为西京（即大理）。蒲蛮火头塑主像，敬于巍山石洞。……用金铸观音一百八像，散诸里巷，俾各敬之。”

南诏末代王舜化贞时，佛教仍很兴盛。《樊古通纪浅述》说：“……权归买嗣（郑买嗣）。主幼，只作俑人而已。唐昭宗光化元年戊午，命董善明铸崇圣寺钟，并后殿观音，高一丈六尺。”这里所说的观音即雨铜观音，明代谢肇淛《滇略》说：“崇圣寺观音像，高二丈许，蒙氏董





善明者，呼天愿铸。是夕天雨铜，取以铸像，仅足而止。像成之日，瑞光五色。”清代王昶《金石萃编》跋云：“崇圣寺在大理府城西北莲花峰下，《云南通志》称寺有观音，高二丈四尺。唐蒙氏时，董善明铸。又称唐天宝间，崇圣寺僧募造大土像。未就，衣骤雨，旦起视之，沟浍皆流铜屑，即用鼓铸立像，高二十四尺，如吴道子所画，细腰跣足。像成，白光弥覆三日夜云。”诸书均说董善明所铸，惟《南诏野史》却说“蜀人李嘉亭成像”，不知何据？

南诏灭亡后，郑买嗣篡位，改国号为“大长和国”。天复二年(902年)“建普明寺，又铸佛一万尊”这数字虽有夸张之嫌，但可见其佛教之盛。

大理国建立后，第一世王段思平不仅“好佛”而且“岁岁建寺，铸佛万尊”(胡蔚增订本《南诏野史》)。元代张道宗《纪古滇说集》说：“其俗尚浮屠法，家无贫富者，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余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而礼佛游玩者弗绝。”可谓佛教之盛极而普泛。

在大理国二十二代王中，就有九位王者或废为僧，或禅位为僧，如段思英、段素隆、段素贞、段正淳、段思廉、段寿辉、段正严、段正兴、段智祥。其中段正兴曾为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等铸观音铜像，该像背面下部还刻有铭文四行“皇帝禀信段政兴资为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等造/记愿禄筭尘沙为喻保庆千/春孙嗣天地标械相丞万世”。该像现藏美国圣地亚哥美术馆(Sandigo Fine Arts Gallery)。

大理国段智兴盛德年间，不仅在剑川石钟山石窟雕凿了不少佛教密宗造像，而且白族画家张胜温还创作了著名的《梵画长卷》(又称《张胜温画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1959年在大理喜洲弘圭山发掘的大理国彦贲赵兴明之母墓幢，其上阴刻“南无尊胜大佛母”，背光上端竖刻汉字七行：“大理国监叶榆郡彦贲赵兴明追为慈妣/妇女娘敬造尊胜一幢妇女娘年/得五十二岁明郡事务三十年则/元亨十一年岁遇乙卯三月/六日辛卯迁化四月十日乙丑设/五七斋镇幢功毕谨记/梵咒师金襴僧杨长生书杨天王长雕”。“元亨十一年”即大理国段智兴元亨十一年(1195年)。

大理国佛教遗迹中，堪称极品的当推现存昆明市拓东路地藏寺遗址的经幢。该幢建于大理国末期，未详何年，由布燮(清平官官号)袁道光为凭吊高明生并扶助幼主高泰祥所建。幢分七级，刻有佛、菩萨、天王、力士等近三百躯造像。此为云南佛教雕刻艺术之精华。

云南佛教至明、清时代已逐渐衰微。

三、道教的传播和影响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形成于东汉中期。它主要渊源于中国上古时期的自然崇拜、鬼神崇拜、民间巫术、神仙思想、方士方术、阴阳五行学说和养生学等。从总体上说，“中国道教的产生过程具有庞杂、

交错、缓慢和教派联系松散等特点”。^①约在唐大历元年(766年),南诏第五世王阁罗凤在太和城立《南诏德化碑》,其碑文中有“阐三教,宾四门”之说。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所谓“三教”,并非指中原汉地所说的儒、释、道三教,而是指巫、道、佛三教。笔者认为此时是否已有佛教传入值得研究。笔者已在前面中表明了中唐入滇说的观点,这里不再赘述。不过,南诏之前和南诏初期,大理广信巫鬼。“巫道同源”,两者有密切关系,加之巴蜀为道教发源地之一,又与滇接壤,南诏曾多次派人到四川成都学习汉文化,故道教从四川传入云南是在意料中之事。

南诏道教到底始于何时?虽史料未见载述,但可以肯定在南诏以前云南就已有道教流布。换句话说,南诏初始就已有道教。阁罗凤时代,《南诏德化碑》仅言“阐三教”,未明确谈及道教事实。到异牟寻时代,“苍山会盟”誓文中已见出明显的五斗米道的三官手书方式。道教所谓“三官”(又称“三元”),即天官、地官、水官。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所谓“三官手书”,即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苍山会盟”誓文中所说“五岳”即指点苍山、乌蒙山、高黎贡山、玉龙雪山、蒙乐山。所说“四渎”,即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漾濞江。至于明代杨慎《滇游记》、李元阳《云南通志》、清代康熙年间所纂《大理府志》等书载述四川道士杜光庭到南诏并书《南诏德化碑》之事,与史实不符,考道教典籍或史料未见载杜光庭到云南大理,又《南诏德化碑》约立于唐大历元年(766年),杜光庭(850~933)尚未出世。据王家祐先生《巍山祠庙记》(附论南诏道教)说:“疑写碑人是唐大历时的刘玄靖,因刘玄靖号‘广成先生’与杜光庭道号全同而误。《湖北通志》引《明一统志》云:‘刘玄靖,武昌人。师王道宗为道士。遍游名山。入南岳,穴石以居。武宗召入禁中受法,赐号广成先生。’唐道士李冲昭《南岳小录》:‘石室隐真宫,大历中,广成先生刘玄靖修真之所。’南岳天台道派为上清支系,源出清虚真人王褒。王道宗为唐薛季昌弟子,薛隐居青城山,今青城真武宫有薛季昌与杜光庭墓。其致误渊源或本诸青城道士而有误记。”^②此说亦属一种推测,因为没有明确的史料可证刘玄靖到过云南大理并书《南诏德化碑》。

据胡蔚增订本《南诏野史·盛罗皮》载:“开元十四年,立庙祀晋右将军王羲之为圣人。”“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这种说法显然有一定片面性,只不过古代云南白族地区尊儒的风气远逊于中原汉地而已。《滇载记》却说“盛罗皮建孔子庙”,《樊古通纪浅述》也说:“开元十四年建孔子庙”。但据《元史·张立道传》说:“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孟,祀王逸少(羲之)为先师”“至张立道时,遂建孔子庙。”若依此说,则元代时云南才有孔子庙。

为什么立庙祀王羲之为圣人?王羲之系东晋大书法家,五斗米道的信奉者。据《晋书·王羲之传》说:“王氏世事张氏(即张道陵——引者注)五斗米道。”后被人纳入道教神系。南诏时,白族人曾到四川成都学习书法,特仰慕书圣王羲之,加之当时五斗米道的盛行,故而祭祀王羲之。

劝丰佑时代是南诏佛教的兴盛期,南诏于唐太和二年(828年)宣布



^①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10页。

^② 参见王家祐《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35页。

废除道教。尽管如此，道教只是被削弱，而五斗米道或明或暗地仍在云南民间流行。直到大理国时期，依然是如此。

元代忽必烈征服大理国后，由于宗教政策的宽容，使云南的道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此时，道教全真派开始在云南流行。以“识心见性”为本，主张道、释、儒三教合一。明、清时，又在云南出现了“正一派”（又称“正一道”），崇拜鬼神，画符念咒，借以驱鬼降妖，祈福禳灾。此乃广为民间所信奉。

元、明、清之前，云南所建的道观远不及佛寺多。元代以降，云南的道观逐渐增多，尤以全真道建的道观为最，如巍宝山上的玉皇观、文昌宫、斗姥阁、青霞观、三皇殿、朝阳洞、元极宫、培鹤楼、道源宫、云鹤宫、长春洞、望鹤轩等。据说昆明龙泉观、长青观、真庆观为全真派宋披云所建。

从道教造像遗迹看，南诏和大理国石窟中是没有的，只有明、清开凿的石窟中才开始出现。如创自明代的蒙自龙门洞石窟和开凿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昆明西山龙门石窟，均系道教造像。

蒙自龙门洞石窟，位于云南蒙自县老寨乡北面5公里的羊街与老营盘之间山顶上之石灰岩溶洞内。现存石刻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关平、周仓、财神共5躯。

昆明西山龙门石窟，位于云南昆明市西山风景区终端。现存3窟，道教造像22躯。第1号窟额浮雕凤凰御书，窟内有诗刻和功德题记共八通。该号开凿于明嘉年间(1522~1566年)。第2号慈云洞，内刻“送子娘娘”、青龙、白虎、星君等。该号凿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由道士吴来清主持开凿。第3号龙门石室，内刻魁星、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八仙、龙马等，窟外顶部浮雕南极仙翁等。该号凿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先由杨汝兰主持开凿，后由杨际泰继续完成。

南诏和大理国的道教从总体上讲，不如佛教的势力和影响，特别是南诏和大理国的一些王者几乎是把佛教当做国教来推行。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道教一开始便与巫教结合，巫教吸收道教的主要内容和神系，并把道教的玉皇大帝作为本主崇拜的偶像。同时，在巫教的《请神词》中，揉进了不少的道教神仙，如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文昌帝君等。^①所以，道教在民间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佛教传入南诏后，曾与巫教和道教展开了斗争。从“观音化梵僧降伏罗刹”的神话故事中，可以见出佛教同巫教的斗争，最终佛教战胜了巫教。又从所谓南诏始祖细奴罗于巍山授记建国的故事，佛教附会出现观音化现梵僧授记细奴罗，而道教为了与佛教争夺势力，又编造出老子降化细奴罗的神话。其结果，还是佛教压倒了道教。元、明、清时期，三教趋于合流，如流行于大理喜洲等地民间的“洞经会”、“拜佛会”，即是三教合流的产物。

徐嘉瑞先生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说：“南诏宗教复杂，有多神教(如本主)，有佛教，有景教(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引者注)，有阿拶利教(即密宗“阿叱力教”——引者注)，大理被称为佛国或妙香国，……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一些宗教，加以分析研究，可以了解南诏及大理国的民族，确是从西北高原迁来。其文化本质(包

^①参见杨宪典《大理白族的巫教调查》，载《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297页。